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18.04.019

19 世纪中叶的广州城市与社会生活

——基于《广州大典》和近代传教士中英文报刊的对照性解读

龙其林^{1,2}

(1. 广州大学 人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6; 2. 哈佛大学 亚洲研究中心, 美国 波士顿 02318)

[摘 要]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束,中国逐步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广州等通商口岸城市开始了近代化转型的过程。近代岭南报刊对 19 世纪中叶的广州城市与社会生活进行了多方位报道,城市发展与畸形消费在报道中得到集中展现,城市化进程中凸显的社会矛盾与城市管理问题,以及日益加剧的中西交流与文化融合的难题,也得到中英文报刊的重视,并由此形塑了 19 世纪中叶广州的城市形象。

[关键词]近代化;《广州大典》;岭南报刊;广州形象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8)04-0100-06

The City and Social Life of Guangzhou in the Middle 19th Century:

A Comparative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and English Newspapers Based on

The Grand Ceremony in Guangzhou and Modern Missionaries

LONG Qilin^{1,2}

(1. College of Humanities,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2.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Boston, MA 02138, USA)

Abstract: With the end of the first Opium War, China gradually became a semi-colony of the Western powers. Guangzhou and other trading port cities bega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Modern Lingnan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covered Guangzhou city and social life in various aspects in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Urban development and abnormal consumption were concentrated in the reports. Social contradictions and urban management problems were highlighted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s well as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problems of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has also been paid attention to by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newspapers, and thus shaped the city image of Guangzhou in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收稿日期: 2018-03-20

基金项目: 国家留学基金委青年骨干教师出国研修项目“中国生态文学的地理分布、现代性焦虑与中国形象的建构”(留金发[2017]3105 号);《广州大典》与广州历史文化研究课题“异域想象与文化记忆——《广州大典》与近代岭南传教士报刊广州城市史料对照研究”(2017GZY19);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近代中英文报刊中的广州城市史料整理与研究”(2017GZYB77);广东省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70022);广州大学 2017 年度青年拔尖人才培养计划“图像史科学的建构——中国文学史著及其研究著作中的图文互文实践与方法探析”(BJ201717)

作者简介: 龙其林(1981-),男,湖南祁东人,广州大学教授,广州大学广府文化研究研究中心研究员,硕士生导师,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访问学者(2017—2018),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近代岭南报刊、转型期中国文化与文学。

Key words: modernization; *The Grand Ceremony in Guangzhou*; Lingnan newspapers; the image of Guangzhou

当前国内学者、出版机构对于晚清报刊所做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工作颇有价值,但迄今为止国内有关的晚清报刊的研究多是对单一报刊的研究,尚无研究者从城市视角来对晚清报刊的城市史料尤其是近代广州的报刊城市史料进行整理与研究。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与视野,一方面以《广州大典》集部别集类为基础,另一方面以近代广州传教士中英文报刊为材料,如《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遐迩贯珍》《中外新闻七日录》《述报》等在反映南中国海历史文化中较有代表性的报刊,从双重视野审视近代广州的城市史料,力图勾勒出近代广州城市的发展及其时代特征;在双重眼光中分析传统士大夫与近代传教士、知识分子对于广州城市的不同印象,分析传统知识分子在巨大时代变革中的心理嬗变与文化冲突。事实证明,通过近代传教士的异域之眼观察此时广州的城市发展状况及政治、社会、风俗、人情,常常能够发现传统文人因习以为常而忽略的诸多细节。

一 近代广州的城市发展与畸形消费

作为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大陆的前沿,近代岭南报刊留下了不少关于近代广州城市消费与城市景观的报道资料。如果说城市地理属于较为浅显的文明层次的话,那么城市消费、城市文化景观则深入到了这座城市的精神内核,展现着一座城市独特的魅力。近代岭南报刊对于广州城市消费、城市文化景观的报道,展现了广州这座千年古城在近代化进程中的形象变迁与时代进步,其对理解广州城市史、广州近现代社会经济文化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清朝政府的失败而告终,西方列强迫使中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口岸通商,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广州等通商口岸,人们逐渐习惯了中西物资的自然流通,在频繁的对外贸易中学会了利用经济规律。在 19 世纪中期的广州城中,商业贸易持续发展,中外商旅聚集于此互通有无。《广州大典》中收录了清代诗人王邦畿的《耳鸣集》,其中卷一《海市歌》中对广州的海市贸易作了形象的描述:“霓虹驾海市市开,海人骑马海市来。白玉楼阁黄金台,

以宝易宝不易财。骊龙之珠大于斗,透彻光芒悬马首。若将海宝掷人间,小者亦能仁桀纣。海市市人非世人,东风皎洁梨花春。海市人服非世服,龙文象眼鲛绡幅。海市人事非世事,至宝不妨轻相示。市翁之老不知年,提篮直立海市前。篮中鸡子如日紫,要换市姑真龙子。龙子入海云雨兴,九州之大无炎蒸。”^[1]为满足日渐增多的中外商旅的需要,广州的城市生活逐渐丰富,消费方式也各种各样。广州等沿海城市的开放,客观上促进了城市近代化的发展与经济的繁荣,但这种不正常的开放方式也使得城市消费处于畸形发展状态。随着近代意义上的城市经济崛起,烟馆、茶楼、戏院、妓院成为广州随处可见的场所。

在时人笔下,当时广州城市的娱乐生活颇为丰富:“珠江水面有形形色色的船舶,它们来来往往,纵横交错,有许多甚至比欧洲船更大、更豪华。有的船只成了寻欢作乐的场所,人们在音乐的伴奏下聊天、饮酒和吃饭,甚至还有妓馆。欧洲商行因其挂在高杆上的旗帜而与众不同,每家商行门前都有一面这样的‘幌子’。建筑这些商行的地方叫做‘十三行’,该街就被称为‘十三行街。’”^[2]这种城市消费的畸形发展状态,表现得最为明显的是鸦片的公开销售与鸦片走私的盛行。当时广州的报纸曾这样描述广州城市对于鸦片消费的严重依赖,以及广州城鸦片盛行的可怖场景:“鸦片烟即洋药,税则每担征收银三十两,厘金每担十六两,另水脚补纹银水加平等项,核计公烟到省,每颗须费洋银两元半。若复转运别处,沿途抽厘,其费加倍焉,因而走私甚伙,或由火船,或由渡船,或径到省,或半途抛下河里而另雇小艇接济者,巧计百出,莫可名状。以广州销畅计,每不下七百担。今查赴关报税者,不逾三百担,况此三百担况中半是转运西北江者,然则广州城洋药,从何而来,由是推之火船走私者固多。而石龙肩挑来省者,亦不少。”^[3]

由于广州通商口岸的殖民地经济畸形繁荣,形形色色的娱乐活动随之兴起,赌博便是其中之一。赌博在 19 世纪中期的广州城市生活中颇为普遍,它既能为民众提供游戏消遣,又能在某种意义上满足广州市民们对于金钱的渴望,许多民众乐此不疲,屡禁不止。广州近代报刊中曾对一中年妇女开设赌场一事进行过报道,从中不难窥测当时的城市

风气与生活方式。《中外新闻七日录》这样描述妇女开赌博摊馆的情形:“闻西关大地有一中年妇人名唤亚肯二姑,平日狡猾异常,巧于逢迎。而凡妇人之与相识者,阳则假以结交游,阴则当鱼肉以资吞噬。伊曾于本月在初旬、在大地开一女摊馆,其勾引妇人赌博者,鱼贯而来,蜂拥而聚,甚至喧哗离还惊扰邻家者,男女为之衔恨,鸡犬为之不宁。”^[4]不过饶有趣味的是,地方官绅闻之极为震惊,迅速将其捉拿归案,并且迅速审判:“西关局绅于十六夜闻之,共为切齿,火速着勇目督带壮丁至大地,将女摊馆三面突围,仅开一面,以放各买摊之妇。而各妇惶恐,或为鼠窜蛇行,或为鸟飞兽走,其状不一而足,斯时止剩槁木死灰。带勇者即喝壮丁,以铁链锁其颈,形众喙同声,皆谓从未见妇人身带银铛者也。亚肯二姑丧气垂头,难掩有觑之面目,一路任人非笑之而已。”^[4]报刊的编纂者,一方面为妇女开摊馆而叹息,一方面也提出了更尖锐的问题:男性开摊馆数百间相安无事,何以女性初开摊馆即被迅速处理?“吾近日观洪圣庙福德里迪龙里西炮台等处,男人开摊馆当数百间,在官绅竟置若罔闻。今不如挈男人,而独挈女人,是不齐其本而揣其末也。扪心自问,其何以自解也耶?”^[4]

赌博之危害甚广,让报刊编纂者心有余悸。为此,身处广州的报刊编纂者,大力夸奖广州官员的清廉端正、禁赌得当:“试观广东抚宪蒋大人,出示严禁赌博后,省佛地方不敢开场聚赌,一律肃清,粤中端正士,无不称颂之。”^[5]但在另一方面,报纸又借香港等地开设赌馆之事,猛烈抨击赌博之危害,其用意或许并不仅仅在于谈论外埠之事,而是有着更具针对性的批评与规劝:“夫士农工商皆宜由正路以习事业,若使专向贪门以罔利,则品行坏而即窃盗所由兴,从此日甚一日,不知伊于胡底”;“其识明见远者,谅不乏人,岂区区赌博之规银可能动其心者,迹其每年多签银两,请牧师往各方传道教化以及开义学以作育人材,无非欲端人心而正风俗,乃一面讲书以警觉愚民,又一面开财以诱惑子弟,是欲益之,而又损之,此开赌之无益二也”;“各庄口所用之买办多是中国之人,无非以钱银相重诿者,假令赌风复炽而庄口之买办见赌动心,保无一时昏迷,为其煽惑而堕其术中,迨输去银两,百计不能弥缝或急而远逃者有之,或逼而自尽者有之,皆赌博者之厉,此开赌之无益三也。”^[5]

任何一座近现代化的城市都有着自身的某种

独特属性,对于素以世俗生活为旨趣的岭南文化而言,城市消费成为其鲜明的烙印。近代西方殖民者以城市为据点向中国大陆进行渗透,他们为了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有意识地赋予城市以不同的符号、形象、趣味,有意无意之中塑造了城市生活中的某些消费领域。西方近代文明的引入,破除了封建专制思想的愚昧,打破了思想的一统局面,人们的道德观念随之逐渐多元、宽容,价值观念也开始了漫长的转型过程。

二 近代广州的社会矛盾与城市管理

随着海外各国纷纷以广州为中转站,前来城市经商、传教或开设报馆等,广州的外国流动人口也不断增加。清代印光任、张汝霖所著《澳门纪略》中如此描述近代广州的城市生活与经济发展:“广州城郭天下雄,岛夷鳞次居其中。香珠银线堆满市,火布羽缎哆哪绒。碧眼番官占楼住,红毛鬼子经年寓。濠畔街连西角楼,洋货如山纷杂处。”^[6]由于晚清地方政府缺乏近代化的城市管理经验,在近代岭南报刊中有关广州城市的报道中常常可见地方政府应对城市治安、社会管理捉襟见肘的新闻。由于国外来广州人员增加,如何管理他们成为摆在广州地方政府面前的难题。就近代岭南报刊中的城市报道史料来看,当时的政府部门似乎从未寻找到有效的管理办法。

由于来广州的外国人增多,华人与外国人如何和平相处成为问题,一些报纸就曾描述外国来者在广州胡作非为、地方政府疲于应付的状态。在《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中外新闻七日录》等报刊中,就记录了不少关于番人违法乱纪的事情。有的是外国人自称为英国人,长期盘踞在广州城内外进行敲诈勒索活动:“闻有两番人自称英人,周流羊城内外,专入各铺勒取银两,少则一元,多则三四元,无人敢阻。不知者以为领事官,必保护他,即禀之,亦不信他有勒索之事,或畏番人利害,故不敢触犯。风闻其身并无利器手枪,而各处更夫以及铺伙,皆不敢挈他解官,真不怪也。”^[7]有的则是因为华番发生口角,最后导致华人殒命的冲突:“又闻闰廿六日晶,河南有一西洋人酒醉,偶遇一唐人以叫番鬼相犯。在西洋人小不忍,即以匕首刺唐人之胸,此唐人受重伤,不能刻下复仇,即疾走入海幢寺避其锋。至一树下,遂倒地而毙。”^[7]更有甚者,长期盘踞在广州的一些外籍人士竟然与官府进行对抗:“河南

有一钉番部店,其楼上有洋客五名租住,中有一名,曾因在街上刺死唐人业已逃去,尚余居者四人。忽于是月初旬番禺县率差役数十名,至此店围拿,实时捉获洋人三名,有一名凫水逃脱。不料于五鼓后,该逃脱之洋人纠党数人,蜂拥回在,将其孖毡掳去。查此洋人是无赖之徒,常在羊城地面假扮官差,巡私缉捕从中取利,而拐带强掳,无恶不为。”^[8]面对外国来华人士之为非作歹,广州地方政府除了虚张声势地飭差拿获外,并无任何实质性的有效应对办法。在许多涉外的社会治安报道中,最后往往未能缉拿嫌犯,遑论知晓嫌犯是何国人。

除了华番常爆发矛盾冲突外,买卖人口也是经常性的报道题材。当时,西方列强为了在殖民地进行生产、攫取高额利润,急需大量的劳动力,为此催生了极为残暴的人口买卖行业。对于买卖人口的目的、拐卖方式,报纸也曾有过令人惊悚的报道:“按贩人出洋,惟夏华拿、真查洲两处为甚。近七八年来,此种人各种俱往,前在宁波、上海,多于黑夜僻处,以麻袋套人。乡民因失人太多,几至酿成巨变。然拐人者必恃线人为援引,且有窝藏,然后敢肆行无忌。今当惩治拐子,以绝其源,尤当严究线人,以除其羽翼,则此风庶几熄矣。”^[9]

对于一座近代化的城市而言,城市官员尤其是地方行政首脑的言论、行为往往代表着城市的管理水平、进步程度,成为衡量城市近代化水平的标准。在西方传教士眼中,晚清地方政府的官员思想保守、封闭,对近代科学知识近乎无知;他们崇拜偶像、推崇异端邪说,却自以为是,行为举止愚昧可笑。在1865年的广州城,曾发生过一件地方行政长官带头求雨的事件,被传教士敏锐地记录到了报刊中。该则新闻如此叙述事情经过:“三月底羊城上宪见米贵时,值春耕欠雨,即率同僚往观音山龙王庙祈求,翌日果大雨。自三杪至,四月初八日止,远近大喜。在大宪轸念民生,即诗所谓民之父母也。寻有老叟言,前嘉庆时旱,有苏藩台独陟白云山龙王庙祈雨,回署雨遂滂沱。”^[10]这一事件中,广州地方行政首脑的行为鲜明地体现了近代化过程中广州所面临的思想观念问题,报刊对此有着严厉的批评:“人皆谓天雨施于龙王,彼亦未思龙亦鳞介中之首耳,乃龙而王名,既以物而僭人之号。谓龙能行雨,且以物而具神之灵,不知天之雨实由于主宰,上神主不肯施雨则难使巫媿徧求天地山川群灵,甚至无神不举,仍不见效。至若愚民无知,往往

一求而时雨下降皆,上主宽恩也,盖无格物致知之学,妄谓雨出于龙,而智慧之人,则归荣于万物之主矣。”^[10]从报道中可以看出,西方人眼中的广州政府行政长官保守、迷信、无知,其作为与广州近代化的历史趋势背道而驰。

广州地方官员不仅对于科学知识十分陌生,无法解释天文地理现象,而且对于行政管理也极不专业。公务活动中,官员们往往依靠贿赂、保护费攫取大量利益,造成政府利益的重大损失。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之后,广州地方政府开始采取措施:“闻蒋抚宪自禁止省中文武员,私受娼赌陋规之后,深虑捕费,无处可取,且恐捕务从此废弛,因面谕藩臬雨司,酌笔馀款,提拨给发各员作为津贴捕费名目,以弥补陋规一项,免各员有所借口,现藩臬两宪议以谬游每月支银一百四十四两,守备每月支银四十四两,千总每月支银十两,外委每月支银五两,额外外委每月支银三两,现闻各武弁,业已纷纷详文,赴投广州府库中请领矣。”^[11]

广州地方官员管理社会的能力和水平低下,广州民众的整体素养同样不容乐观,反映出近代化之后广州民众文化素养的阙如与进步的缓慢。在广州的报纸《中外新闻七日录》看来,广州城民众们文化素养普遍不高,人们只注重于金钱与现世享受,而缺乏探讨学问、认识事物本质属性的兴致。《遐迩贯珍》曾作过的一篇报道,足以反映广州民众对于外国游客的轻慢与冒犯:“二月十六日,有英人三名,在广州江浦司一带游览。忽遇附近乡村匪众群起,殴抢,伤人,掠财。”^[12]报纸分析了英人在广州城被殴抢的原因,认为最根本的还是民众的异常冷漠:“若中土人三名在英国地方游行,有乡人如此待之,其临近居民必全出诅喝,交口訾之。中土人众远适异国者,实繁有徒,其声明四扬,可推为识情达理。今似此行为,是禽兽之不如矣。”^[12]民众对于于己无关之事的长期缄默,助长了城市的不良风气。发展到后来,广州城市的社会风气逐渐败坏,民众对于拐骗、坑蒙等行为司空见惯:“羊城向有拐子,骗买婢子与孀妇,伪为妻妾。迨交银后,假作回里,落艇即驶往别处,换船直往旧金山地方,卖与寮中为妓。倘若不从,则以鞭撻逼之。此等所为,真天良丧尽矣。旧金山六会馆公所之人,见此拐骗,其心惻然,曾于咸丰三年严行禁止,已有明条第日久视为具文。该匪仍循故辙,今月复出长红,标贴羊城各处以惩奸究而悯善良。”^[13]

受西方列强产品倾销的影响,传统小农经济日趋凋敝,破产的农民不断涌入广州谋求生路。由于广州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就开口通商,社会、经济受西方近代文化影响有了一定的进步,但在封建社会不断解构、殖民地程度不断加深的情形下,城市的社会治安与公共管理也面临着极大的考验。

三 近代广州城市的中西交流与文化融合

与拥有灿烂传统文化、悠久历史的中国相比,欧美国家近代以来素以先进文明自居,科技的发达、军事的强大、殖民的胜利,使得他们在看待中国城市、中国人时常常带有一种暧昧的立场,既充满猎奇、艳羡的目光,又带有自大、抵触甚至是轻蔑的态度。在经历了近代文明洗礼后的西方人看来,中国是一个矛盾结合体,既古旧、灿烂,又专制保守、公德阙如,民众在封建王朝的威严之下怯懦无声。中国经由鸦片战争的失败骤然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无论是政府体制、官员思想还是社会习惯、规章制度,均难以与变幻莫测的现实情况匹配。因此,随着进入广州城市的外国商人、传教士、游客逐渐增多,不时发生一些不太和谐甚至是尖锐冲突的事件。虽然广州地方政府依照媾和协议对在穗外国人进行了保护,但实际效果似乎并不太尽如人意。

与广州城市中的中国官员沉迷迷信、收受贿赂,以及中国民众冷漠、自私的形象形成对照的是,近代岭南报刊中对来华的欧美人有着迥然相异的报道。来华的欧美人士往往为传教士、医生、使领馆人员,在近代岭南报刊看来,这些人富有牺牲自我、追求真理、服务社会的精神。这固然与近代岭南报刊多为传教士创办或有宗教背景相关,但更主要的或许还是在于文化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视角、思维的不同。在近代岭南报刊有关广州城市中西方人们报道差异的背后,一方面可以看到西方近代文明与传统中国文化的巨大观念落差,另一方面也可以明显感受到报刊编纂者传播基督文明的执著、教化民众的信念。一些刊物的编纂者试图通过对来华西人无私奉献精神的刻画,增进中国民众对于西方文化的认同,并借此更为顺利地传播基督福音。

在近代岭南报刊中,常常出现在刊物中的来华西人多为教师。他们开设塾馆,探求真理,传播文化,成为开化中国民众的先行者。广州是西方国家从南中国海域进入中国的前站,来华西人多有在此

停留或居住的经历,这为他们熟悉中国语言、环境提供了绝佳的契机。来华西人经常开设私塾学堂,免费或以低廉学费招收中外学生,教他们同时学习英文、中文、地理、物理等知识,使他们能够较早地具有宽广的视野。广州的中外书塾就是其中的一个案例。“羊城中外书塾之设也,是延中国举人与西国名儒主席,专以中外文字教习生徒,历有年所矣。兹又将届一年,必须考选以别其才之优劣,以分其功之怠勤。现于十一月初一日,各国领事府暨中国缙绅及洋商等,均到馆内品定其列:第一班一名虑念劬奖银七元,二名冯维茂奖银三元、寒暑针一枝;第二班一名黄亚德奖银五元,二名黄文业内奖银三元、寒暑针一枝;第三班一名黄菊泉奖银五元,二名黄榕根奖银三元;第四班一名林亚河奖银五元,二名高东成奖银三元。以上各人俱能淹通英文,其中明达唐文者梁耀炳奖银四元,胡永中奖银四元,而胡户中因周年到馆策力弥勤特加奖银四元,至终年勤读且能恪守规矩者惟梅亚树亦奖银四元。此皆鼓舞人材,奖励后进之意。想各学者谅能倍加其功,从此进德修业,由小学而臻大成者,可拭目俟之矣。”^[14]

除了私塾学堂之外,许多报刊还通过介绍刊物来宣传西方传教士及其文化价值观念。《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不定期地刊登一些介绍自家刊物的文章,不遗余力地宣扬中西民众的友情,尤其是显示外国人对于中国民众的友善、帮助,希望以此来增进中国民众对自己的了解,消除中西文化之间的隔膜。《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中曾有一篇《招签题》,主要讲述该刊创办的背景和资金来源。该刊真实的出版意图是希望通过刊物的编辑和发行,告诉中国人西方的科学、技术、文化,消解中国人的保守和自满心理,以此来推动西方文化在中国的输入和传播。

在近代岭南报刊中,来华西人中的光辉形象系列中除了牧师、教师、编辑外,最为突出的当属医生。许多来华医生具有传教士背景,或者说传教士以医学为途径来传播宗教。这些传教士通过自身高超的医术为封闭、保守、落后的中国民众解除病痛,赢得他们的信任,并以此为契机传播基督福音,这往往比一般的传教更有立竿见影的效果。在近代岭南报刊中,编纂者对于在广州城市生活、工作的医生的报道多注意其高明的医术、无私纯洁的信念以及仁爱博大的胸襟,中国民众对于这些医生也

颇为接受。借助近代岭南报刊中的医生系列报道,传教士们向中国民众传播了西方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帮助他们形成对于基督教的想象和对西方文化的认同。近代的岭南报刊,时时不忘提醒华人读者,行医不仅仅是一种科学技术,而且是与基督福音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宽仁孚众,是耶稣门生本所当为。今有此教之门徒普济施恩,开医院广行阴鹭书情,真可谓怀赈急之仁。每日接杂病人及各项症效,且赖耶稣之宠祐,医病效验焉。有盲者来,多人复见,连染痼疾,得医矣。四方之人常院内拥挤,好不闹热。医生温和慈心,不忍人坐视颠危,而不持不扶也。贵贱、男女、老幼,诸品会聚得痊。”^[15]经过报纸如此诠释与宣传,医者及其背后的基督福音显然具有了更为广泛的知名度。这些医生不仅治病救人,而且还撰写医书,传授治病之理,以此推广近代西医及传播基督教。

通过对近代岭南报刊中广州城市史料的搜集与梳理,可以发现西方殖民者如何影响广州这座城市的近代化进程,从本质而言,这也是西方资本主义对被迫开放的中国城市进行运作、管理的内在逻辑。透过近代岭南报刊中有关广州城市的史料,我们得以重返近代广州的地理、日常生活、城市消费、社会问题、人物塑造等现场,它勾勒出了西方殖民主义对于近代城市的治理观念,以及广州城市在中西文化夹击中迅速发展、逐渐趋于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对于广州城市历史的回溯,可以丰富人们对于广府文化的认识;对于广州历史文化名城建设的重新审视,可以吸取近代化广州城市化过程中的教训与启示,为当前的广州城市化建设提供借鉴,推动广州历史文化名城的建设。

参考文献:

- [1] 王邦畿. 广州大典集部别集类第五十六辑·耳鸣集[M]. 广州:广州出版社,2015:771.
- [2] 贡斯当. 中国 18 世纪广州对外贸易回忆录[M]//纪宗安,汤开建. 暨南史学:第 2 辑.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368.
- [3] 湛约翰. 洋药走私[N]. 中外新闻七日报,同治五年十二月廿六日.
- [4] 湛约翰. 西关女摊馆近事[N]. 中外新闻七日报,同治五年三月廿六日.
- [5] 湛约翰. 香港近闻[N]. 中外新闻七日报,同治六年七月初二日.
- [6] 印光任,张汝霖. 广州大典史部地理类第三十四辑·澳门纪略[M]. 广州:广州出版社,2015:345.
- [7] 湛约翰. 中外近事[N]. 中外新闻七日报,同治四年六月初五日.
- [8] 湛约翰. 河南近事[N]. 中外新闻七日报,同治四年六月廿六日.
- [9] 湛约翰. 拐卖人口近事[N]. 中外新闻七日报,同治四年九月二十一日.
- [10] 湛约翰. 论雨非由龙王[N]. 中外新闻七日报,同治四年四月十七日.
- [11] 湛约翰. 羊城近闻[N]. 中外新闻七日报,同治六年正月初十日.
- [12] 麦都思. 近日杂报[J]. 遐迩贯珍,1854(3/4).
- [13] 湛约翰. 六会馆复禁卖良为娼[N]. 中外新闻七日报,同治六年正月二十四日.
- [14] 湛约翰. 中外书塾考试[N]. 中外新闻七日报,同治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 [15] 爱汉者. 广东省城医院[J]. 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道光乙未年六月.

责任编辑:黄声波